

## 藏传佛教文学论略

索南才让, 张安礼

(西藏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 藏传佛教文学史是西藏僧人在佛教实践活动中创造文学的历史。藏族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佛教紧密联系。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几乎都涂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藏传佛教文学历史上,许多著作兼具历史、哲学和文学特征于一身,而且作者本人亦是僧人兼文学家、诗人、思想家,这种共生现象比比皆是。这是藏传佛教文学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 藏族; 藏传佛教; 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5-0076-05

###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SUONAN Cairang, ZHANG Anli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literature is the literary history created in Buddhist practical activities by the Tibetan monks. The Tibetan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Buddhism from the beginning and has a strong religious color in works' theme, characterization, plot structure, etc.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literature, lots of works incorporate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author is not only a Buddhist, but also a litterateur, a poem and a thinker. This kind of symbiosis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and it is also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Key words:** Tibetan; Tibetan Buddhism; literature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他们世代生息繁衍在被称为世界之巅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凝重、庄严、神秘的土地上,不仅处处显示着历史前进的足迹以及优秀高原文明和文化成果,同时,也并存着生命轮回说和浓烈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围。<sup>[1][3]</sup>形成于这个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中的藏传佛教文学,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丰富多彩,它像一面洞察历史的镜子,生动而全面地折射出藏族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审美情趣。一千多年来,佛教高僧大德们在清亮的佛号声里、在袅袅的煨桑烟雾中、在不灭的酥油灯盏下,用他们捧读经书的双手默默无闻地记录着。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西藏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根本没有纯文学的作品。他们撰写的文学作品里,有宗教活动、有生活细节、有歌有舞,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因此,藏传佛教

收稿日期: 2013-06-18

基金项目: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2014 年度重大出版项目 12 卷 25 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索南才让(许德存)(1962-),男,藏族,青海乐都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藏学。

张安礼(1966-),男,安徽怀远人,安徽省怀远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哲学、历史与文学。

文学作品自然地形成了历史、哲学、诗歌并肩携手、融为一体的特色。

## 一、宗教与僧侣创作

众所周知,藏族几乎是一个全民信仰宗教的民族。由于地处高山环抱之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强烈依赖感,所以对山格外崇拜,视山为连接天地的梯子,通过它把入世间的一切信息带给天神。尤其是苯教,作为藏族传统宗教文化的源头把一切自然现象人格化、神圣化而加以崇拜祭祀,宗教对藏族人来说既是一种信仰,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中不能没有宗教。

佛教传来之前,藏族信仰的是土生土长的苯教,其中有许多神话传说故事。从口头流传和书面记载来看,藏族的神话非常丰富,内容上大致分为自然神话、生产劳动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三大类。“这些神话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高原色彩;表达了藏族先民们对劳动创造的赞美和对斗争胜利的歌颂;反映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不但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研究藏族远古时期的发展历史、思想观念、道德情操、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珍贵资料。”<sup>[2][P10]</sup> 这些神话故事后来被整理成文字记录,成为研究藏族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也成为文学创作的最佳材料。目前流传最广的自然神话中反映宇宙观的有《斯巴宰牛歌》、《大海变陆地的故事》和苯教的由空造神、神造宇宙和人的创世神话等,不但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而且把自然人格化,突显了高原特色。人类起源的神话主要有《猕猴变人的故事》、《卵变世界和人》等。生产生活方面的神话故事更多,如《青稞种子的来历》、《七兄弟的故事》等。

藏文史籍记载,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第二十八代首领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佛教传入西藏,说他是金剛手菩萨的化身。一天雨后,他独自走上雍布拉康宫顶,远眺南方威严的雅拉香波神山,俯视雅隆河谷肥沃的土地,仰望天边白云伴着五光十色的吉祥彩虹,那美丽景色,引发他无限的感慨。正在这时一只用丝绸包裹的宝箱落在他的脚下,仔细端详,不知何物。于是,召集众臣打开宝箱,看见里面装着两部如意经卷和精致发光的金塔、牟尼罗印、如意珠印牌等。大臣中没有人能看懂经典,更不解其意,只好埋在地下,因此赞普(首领)福份消减,农田遭灾,粮食歉收,饥谨灾病不断。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梦,梦中出现五个人质问他“您为何将天降神物掩埋在地下?”梦醒后,他感到掩埋天降圣物是罪过,于是命人将宝箱掘出,当作吉祥象征物供放在雍布拉康宫殿内,命名为“年波桑哇”,意为“玄秘圣物”,每天以香、鲜花、谷物和酥油灯供奉。<sup>①</sup> 这个深受苯教天神崇拜思想影响的佛教如何传入的故事本身有着浓郁的文学色彩。尽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在无从考察,但是最起码从史书收录的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佛教经典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已经传入雅隆部落的腹地地带,只不过传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直到七世纪早期,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政权后,随着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将佛教经典和佛像带到拉萨。吞米桑布扎等人从印度学成回来后,根据藏语发音,参照梵文创制了现在所使用的藏文,组织人员培训从梵文和汉文翻译出几十部佛教经典。这是藏族用新制的藏文翻译佛教经典之始,由于参与译经的人数有限,再加上当时吐蕃自己还没有出家僧人,译经规模、译经数量、译经内容都非常小,根本谈不上进行佛教文学创作。

八世纪中期,赤松德赞实行抑苯兴佛,先后延请寂护、莲花生、莲花戒、无垢友等人来吐蕃传法译经,修建了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桑耶寺,试度贵族弟子出家为僧。同时,在桑耶寺专辟供译经用的“印度翻译洲”(即译经殿),组织力量将大量的梵文、汉文等十几种不同文字的佛教经典翻译成藏文,使吐蕃译经达到高潮,涌现出了被称为“罗杂瓦惹古”(lo - tsav - ba - rab - dgu)的九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们在翻译的同时,开始撰文阐释佛典,留下了不少具有浓郁佛教风味的诗作。《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总结说“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一方面政权巩固,疆域扩展,使藏民族达到了发展顶峰,另一方面从印度、汉地、于阗、迦湿弥罗、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引进佛教经典和其他各种文化书籍,翻译事业达到高潮,并建立了僧伽组织,发展讲、辩、著事业。吐蕃在施行佛法的同时,民族思想、民族意

<sup>①</sup> 许德存翻译手稿。

识、民族行为和民族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sup>[3] (P158)</sup> 为了统一所译经典的名称、用语和数量等,赤松德赞王组织僧人搜集分藏在各个宫殿、寺院的译经,开始编撰佛典目录。他去世后的两代王期间,加强了对译经工作的管理,翻译什么经典、用什么方法翻译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继续先王的编目工作,先后完成了被称为吐蕃三大佛典目录的《丹噶目录》、《旁塘目录》、《青浦目录》和工具书《翻译名义集》。其中的《旁塘目录》和《青浦目录》已失传,《丹噶目录》被保存下来,将全部经典分成 24 类,共 730 多种。这些经典的绝大多数不仅从文体、修辞、译笔,还是语法等方面都具有较浓郁的文学色彩,可以作为佛教文学进行研究。

从 10 世纪开始,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大量的纯文学作品也被翻译进来,尤其是诗学名著《诗镜论》、《龙喜记》、《如意藤》、《百赞》等一批梵文诗作翻译成藏文,引起了藏传佛教高僧们的极大关注,受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陆续产生了独具藏族特色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格言,如早期的哲理诗集《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后期的《水树格言》、《甘丹格言》等。从十四世纪以后大量的历史文学、传记文学开始涌现,其中较著名的有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巴俄·祖拉陈哇的《贤者喜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西藏王臣记》以及桑杰坚赞的《米拉日巴传》等等。这些佛教文学作品以写历史、人物为主线,同时运用佛教故事、传说、寓言等多种文学创作手法,使得作品颇具文采、妙趣横生。

总而言之,藏族文学从一开始就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尤其与佛教的关系更加紧密。按照佟锦华的话说:佛教在藏族地区的传播,不但为藏传佛教文学的产生、发展与繁荣铺垫下了丰厚的宗教文化沃土,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个僧侣创作群体。尽管吐蕃王朝时期尚未出现作家文学,但是大量的口承诗歌、神话传说、谚语、传记、卜辞、编年史及译经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佛教思想与藏传佛教文学

宗教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与宗教密不可分,是宗教活动的产物。宗教文学以文学作品为表现形式,以传播教义为目的。<sup>[4] (P28)</sup> 学术界有这样的观点: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文学的源泉,藏传佛教文学与佛教典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从历史发展上看,公元 7~9 世纪时,佛教陆续传入藏族社会,大量佛教经典译成藏文,在思想上和翻译文体等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佛教文学酝酿萌发阶段;9~13 世纪,是佛教文学正式兴起、形成阶段。这期间,首先是 9 世纪末朗达玛灭佛,至 10 世纪末,佛教在西藏沉寂百年。11 世纪以后又很快发展起来,并建立了不同的佛教派别,出现了文化领域和学术界相互辩论、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艺术上百花齐放的时代的到来,以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产生和发展;13 世纪以后,是文学兴盛发展阶段。从文学范畴的具体情况说,出现了新的文学式样和文体,扩大了创作范围,充实了创作内容,丰富了表现手法,从而在多方面推动了藏族佛教文学的成熟与繁荣。

藏传佛教文学与其他文学一样由口承文学、史传文学(包括历史文学、传记文学)、戏剧文学等组成。藏族的作家队伍,尤其是 1950 年代以前的作家基本上是僧人,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作品的内容具有浓郁的宗教思想。佟锦华在其著作中说:作为藏族作家群体的主力,僧人毕生接受封闭的寺院经学教育,佛教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报应、缘起性空、如来藏佛性等思想对他们影响至深,“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决定着他们的创作思想”。<sup>[5]</sup> 几乎他们所创作的所有作品弥漫着浓郁的佛教思想,这些作品也以传播教义为目的。如桑杰坚赞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便是这方面的典范,它受到深刻的社会现实影响而充满着“四圣谛”、“四法印”等原始佛教思想。“米拉日巴所修的宗派和法要是所谓‘无上密宗’,但他的作风和精神处处显示出原始佛教中的朴素、艰苦与实践。”<sup>[6]</sup> 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原本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物,他的性格和言行,决定于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社会关系和生活规律。由于传记文学要描绘社会生活的具体情景,于是文学形象就要保持着生活现象的具体可感性。文学的反映必须通过作家主观意识的分析、选择、加工改造。

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教义。宗教教义不仅是宗教信徒思想、行为的准则和宗教文学的灵魂,而且还对后世文学作品的主题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封建农奴制社会时期的每一部文学作品几乎渗透了

佛教思想,众多的传记文学作品是这样,就连具有文学色彩的史籍也如此。佛教不仅影响着藏族文学的内容,而且也深刻影响着表现形式。”<sup>[7] (P448-449)</sup>佛经本身体裁繁多,如长篇故事、戏剧、格律诗等,因此相应地多方面多层次地影响着藏传佛教文学。米拉日巴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面对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仍义无反顾,心无旁骛执着苦修。出生苦、肉体苦、精神苦、现实苦,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挫败他立志成佛的信念。在一般人眼中的苦,在米拉日巴眼里就是乐,因此要辩证地看待苦和乐。据《青史》记载,米拉日巴在西藏下部地区云游时,当地施主担心他饿死,前往山中寻他。众人说道:“我们为此而来代众乡人向你问好?”米拉日巴说:“瑜伽师我身甚安乐!施主贵体亦安否?”还唱出许多歌词。<sup>[8] (P45)</sup>从米拉日巴答语中,丝毫看不出“苦”。文学作品中要求塑造的典型人物,正是要通过人物的具体的言行揭示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米拉日巴直接继承了佛教“苦”的内涵,反映了佛教的基本思想与实质。如他对“苦谛”咏唱道:“我等众生世间人,生老病死四河深,人人难逃皆有份,轮回苦海不断根。溺于苦海不自知,安乐幸福无一时,怕苦反倒自作苦,祈福却做罪孽事。要想解脱人间苦,恶行罪愆应戒除,死时修法是正途。”<sup>[9] (P79)</sup>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是萨迦派的第四代祖师,也是藏族史上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他的《萨迦格言》是藏族格律诗的代表作,广受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他在作品中引用佛经故事,根据佛教思想,结合社会实际,阐述治国之道和处世哲学,主张以佛法治国,开展布施活动,救济贫穷,大力宣扬佛教的思想。如说:“经常以仁慈护佑属下的君主,很容易得到奴隶和臣仆,莲花盛开的碧绿湖泊里,虽不召唤,天鹅自然会飞集”;在讲到“苦”的时候,《萨迦格言》写道:“哪个有情和哪个有联系,全是前生宿业注定的;请看鸢鹰要背负土拨鼠,水獭要向猫头鹰献鱼。”贡噶坚参利用藏族传统的民间鸢鹰要背着雪猪子飞,水獭捉了鱼要献给夜猫子吃的故事,通过佛教“因果报应”或“业果报应”思想来说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富人与穷人是由“业”决定的。

除了格言诗作,史传文学、长篇小说、寓言小说,甚至是戏剧等都渗透了宗教思想。如著名的《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青年达美的故事》、《郑宛达瓦》、《莲苑歌舞》、《猴鸟的故事》、《婆罗门传》等都是这样。由于作家队伍的特殊性,几乎所有的著作的写法都是按照佛教或宗教发展的历史线索写出来的,宗教色彩非常浓郁。《西藏王统记》成书于公元十四世纪,其作者是萨迦派高僧索南坚赞。尽管它是一部历史著作,但有浓厚的文学情趣,诗文结合。全书十八章几乎每一章都与佛教有关,其中用了不少神话、佛经故事、传说。在提到人类起源时用了民间广泛流传的“猕猴变人”的故事,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最早没有宗教渲染,但是该书却把故事中的采食野果的猕猴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菩提心猴”,把以食肉为生的体格高大的雌猴视为度母化现的罗刹女,两者结合生下六个小猴崽,它们吃了观世音菩萨撒在大地上的种子而长成的粮食后逐渐变成了人。

《青年达美的故事》(《循努达美》)是藏族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由俗人作家写的小说。书中采用偈颂和散文结合的形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满篇宣扬佛教的轮回思想。《郑宛达瓦》是十八世纪由达普寺第四代活佛阿旺罗追嘉措所作,书中贯穿了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通过主人公郑宛达瓦来劝谕世人,认为要想脱离贫穷、解除痛苦,必须皈依佛法,大力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如书中写智麦班丹喇嘛对郑宛达瓦说:“你原来是释迦族之子,笃信佛法,后经无数次的转生,投生在东方的一个国家里,当了王子。幼时信奉佛法……。”这里以佛法的标准来做人,凡是正面人物都是信仰佛法者。

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原本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物,他的性格和言行,决定于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社会关系和生活规律。由于传记文学要描绘社会生活的具体情景,于是文学形象就要保持着生活现象的具体可感性。文学的反映必须通过作家主观意识的分析、选择、加工改造,因此文学现象也就体现着作家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感情态度。《米拉日巴传》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它受到深刻的社会现实影响而充满着“四圣谛”、“四法印”等原始佛教思想。佟锦华说:“佛教渗透到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弥漫在每个角落,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藏族人民的道德标准、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无不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反映藏族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几乎都涂抹上了厚厚的宗教色彩,渗透了浓浓的佛教汁液。”<sup>[10] [P99]</sup> 由于藏族几乎是全民信教,宗教尤其是佛教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之中不乏浓郁的宗教色彩,甚至这些著作成为宣传佛教思想的重要手段。

### 三、佛教徒兼文学家的共生现象

在比较文学中,“共生现象”指的是许多哲学家同时是伟大的作家,而许多伟大的作家往往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文学的论述都是从哲学起步的。<sup>[11] [P195]</sup> 柏拉图的大部分哲学著作,如《理想国》、《依安篇》等,都是用对话的文学形式写成。我们这里借用的“共生现象”概念,具有比比较文学所定义的更为广泛的含义。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群体。在西藏文学史上,不仅某部著作体裁兼具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而且著作者本人亦是佛教僧人兼文学家、诗人。这种共生现象在西藏佛教文学史上比比皆是。

过去僧人掌握着知识,被看成知识分子,纵观历史,在藏传佛教文学史上,11 世纪以后,佛教僧人身兼文学家的共生现象,成为藏传佛教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是出自僧人之手,甚至描写男女情爱的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是由僧人写的。如著名的史传文学《拔协》的作者拔赛囊、《西藏王统记》的作者索南坚赞、《贤者喜宴》的作者巴沃·祖拉陈瓦、《西藏王臣记》的作者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米拉日巴传》的作者桑吉坚赞、《宗喀巴传》的作者克珠杰等等都是僧人。18 世纪,虽然出现了非僧人的俗人作家如多卡瓦夏仲·次仁旺阶和多仁·丹增班觉等极少数几个人,但是在几千人的作家队伍中像他们这样的非僧人作家寥若晨星,屈指可数。<sup>[12] [P4]</sup> 而且多卡瓦夏仲·次仁旺杰和多仁·丹增班觉也接受过寺院的佛法教育,他们的知识就是在寺院里学到的。毫无疑问,藏传佛教在藏族历史上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给佛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佛教思想又成为僧人文学创作思想的灵魂,很多作品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有意识无意识地宣传佛教人生观,演绎佛教的基本教义,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藏传佛教文学的始终。

#### 参考文献:

- [1]姜 安. 藏传佛教——雪域高原独特神秘的文化现象[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 [2]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 藏族文学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 [3]恰白·次旦平措,等. 西藏通史[M]. 陈庆英,许德存等译. 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
- [4]智 川,叶志刚. 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文学[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 [5]佟锦华. 藏族古代作家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兼论编写藏族文学史应注意的基本原则[J]. 中国藏学,1990,(2).
- [6]桑杰坚参. 密勒日巴尊者传[M]. 张澄基译. 香港:觉圆精舍,1993.
- [7]申新泰,许德存等. 西藏宗教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
- [8]周 炜. 西藏文化的个性——关于藏族文学艺术的再思考[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 [9]丹珠昂奔. 佛教与藏族文学[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 [10]扬 帆. 盛开在雪域高原的一朵奇葩[J]. 西藏文学,2011,(5).
- [11]吴家荣. 比较文学新编[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 [12]佟锦华. 藏族古典文学[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张立荣)